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先秦儒学视域下的 中华民族精神研究

唐明燕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先秦儒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

唐明燕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儒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唐明燕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09015-3

I. ①先… II. ①唐… III. ①儒家-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②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研究 IV. ①B222.05②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2010)第 110489 号

先秦儒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

XIANQIN RUXUE SHIYUXIA DE ZHONGHUA MINZU JINGSHEN YANJIU

唐明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2200 册

ISBN 978-7-01-009015-3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总序

科学和人文是一对孪生兄妹,两者可以说是“相融是利,相离则是‘半个人’”(杨叔子语)。

英文的 science 一词基本上指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 science 来自拉丁文 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 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 scientia 类似,含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从静态的观点看科学是一种认识成果,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科学是小规模的运动,主要是少数学者和哲人的个人活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相继建立了一批大学和科学院。尤其 19 世纪以后,科学活动的规模空前扩展,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才迅速发展。到现在,科学活动不再是少数人进行的纯学术研究,而是由众多社会成员参加,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科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事业、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如今运用动态的观点把它看作是进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认识世界的一种过程,生产科学知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科学技术能使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帮助人类提高认识能力,同时人的认识世界的预测能力更是全面提高,突出人的主体性,表现了科学认识的能动性。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它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一种高尚的文化成就。早在 17~18 世纪,科

学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被纳入整个文化体系,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到了19世纪中期,科学文化更是蓬勃发展,在某些人心目中,科学文化简单是文化的典范,代表着文化的未来。如今,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科学文化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过程。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汇,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且科学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政治、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传统。

英文的 Humanities 直接来源于拉丁文 Humanitas,而拉丁文 Humanitas 继承了希腊文 paideia 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 Humanitas 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 Humanitas 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 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 humanitas 以希腊文 paideia 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①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① 参见吴国盛:《反思科学》,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人文学科一词来源于公元前 55 年,西塞罗在其《论雄辩家》一书中首先把 *humanties*(人之品质)列为辩论者的一项基本训练项目。后来经过希腊罗马修辞学学者的发挥,*humanitas* 就成了古典文科教育的基本大纲。再往后,由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教父们使之转为基督教服务,它又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基础教育,构成了称之为 *artes, bone artes*(“通艺”)或 *artes liberals*(“自由艺术”)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数学技艺和语言艺术,也包括某些科学,历史学以及哲学。欧洲十五六世纪时期开始使用此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区别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等。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仿照美国体制分为 3 个学院,其中的文学院教授的就是人文学,简称文科,以别于教授自然科学的理学院和教授社会学的法学院。

科学与人文都是社会文化现象,所以对它们的考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系统去孤立分析。科学与人文本来是统一的。在古希腊时代至欧洲中世纪,科学和人文皆被包含于哲学之中,是处于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状态之中,当然,这种浑然未分的统一是由于科学和人文学科皆未分化的结果。近代以后,当人文学科从中世纪的神学解放出来,尤其是科学真正意义上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时,科学与人文真正走向独立。此阶段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双向互动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机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相互对立,彼此竞争的互斥机制。人文运动把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用理性来对抗神学迷信,就是这一阶段科学与人文携手共进的重要目的之一。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科学在西方已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或学说了,它已是建制化的活动,已是最有权威性的实践。到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成为主旋律,几乎占领了整个知识领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就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另外科学对社会系统的作用愈来愈大,成为推动社会系统进步的主要力量,从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然科学绝对化,产生

了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观,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经验的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即实证的。科学几乎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即“判定什么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科学主义的诞生不仅否定了宗教权威,而且动摇了以人的感性经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人文知识体系。而这一时期人文精神对社会的影响日渐消退。科学与人文之间表现出逐渐分离的趋势。人文固守绝对价值目标,忽视通往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道路。

近代以来,科学探索与人文探索关注事物的角度、它们的知识系统、文化思维、问题域和观念系统等等不同,科学和人文处于分化,对峙状态,甚趋于紧张。另一原因是人为原因,这就是受现实的功利价值、经济效益驱使。在现代社会,随着实证科学和近代技术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角色转换。由于社会制度的作用,自然界开始变成被人们操纵的对象和被人们利用的工具,人本身变成了中心。科学作为工具价值的一面和作为目的的价值的一面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以致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科学的异化现象,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征服,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把当代人类推向了严重的生存困境。科学成了统治人的外部强制力量,这种状况,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家不是对科学本身的异己性进行批判,而是对科学本身进行拒斥,用人文世界拒斥科学世界,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并用艺术精神和非理性主义来取而代之;而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思想家则把科学的人文价值从科学的价值中剥离出来,把科学理解为与人生存的意义完全无关的关于纯粹事实的科学,并进而用科学世界拒斥人文世界,科学与人文截然割裂。科学主义者突出强调的是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或贬低人文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本主义者则突出强调艺术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便进一步加深了。19世纪末最接近于对“两种文化”的分野进行表述的,是标榜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

凯尔特,他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

自从实证主义产生之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别日益明显。实证主义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严格区别科学与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提出了分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此后这一问题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被科学哲学家们广泛而激烈地争论。从总体上来看,自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中叶,思想家们大都在论证两种文化的独特性,给它们划界。实际上,这无意中加深了两种文化的裂痕。自20世纪中叶之后,思想家们大多从揭露两种文化的分化的弊端出发,寻求弥合两种文化裂痕的途径和方式。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同狭隘的实证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无法看到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人本主义者只看到科学技术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直接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因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同人的生存、栖居、自由和发展的深刻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近代人文主义运动在近代前期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而在近代后期,由于科学自身独立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功利主义的应用,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排斥,相互分离。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科学主义的悲剧还是悲观的科学虚无主义的误区,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离开了科学与人文的整合所致。

从整个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的教育都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培养。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人文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中国在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在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深受原苏联的影响,文理分家,理工分校,专业面狭窄。我国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法、经、社、农、医、工程

等主要学科中,理工科比例太大,造成畸形发展。人们在思想上重工轻农,重理轻文,重“硬科学”轻“软科学”,即便在文科中,人们又存在着重社会科学轻人文学科的倾向。

当前,对于理工科大学生来说,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尤其重要;对于文科大学生来讲,提高科学素养也是当务之急的问题。通过近十几年来的努力,人们已经逐渐形成了“大”文化素质教育观。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要相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要相融,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要相融。相融则利,相离则弊。科学素质、科学精神,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就是在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中形而下的东西,经过人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人的实践,在实践中深思,在实践中体悟,在实践中磨炼,内化升华,形成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东西。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精神就是人文的东西,所以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的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就是应以“实事求是”作为其基础的求善精神,从这一角度讲,就是求善的科学精神。科学与人文都有共同的追求。科学追求真,人文追求善,两者结合,保证追求正确,保证结果可以完美。这就是追求真善美高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真善美都是围绕着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的明天。一个正确的思想,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必定是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科学技术思维跟人文艺术思维的高度的统一。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自1999年成立以来,学院的发展得到了学校领导以及学界同仁、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经过10年的努力,学院在人文社会发展方面基本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在教学上,由以“两课”为主的教学工作向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导、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教育快速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人才培养上,由专本科和短期培训为主向本科生、研究生培养为主转变;在教学与科研关系上,由教学主导型向学科建设为基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并重的模式转变。目前,随着学科快速发展的需要,学校在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中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正在按照“文理渗透、中西融汇、学研一体、博专结合”的理念,努力形成以文理工

管交叉渗透为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

2006 年大连理工大学决定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07 年就拿出 112 万专款用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决定以后每年拿出 100 万元作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这可以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2009 年学校又提出文科要入主流,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期待,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理所当然地要一马当先,提升我们的学科水平。基于此,我们在编辑出版“科技哲学与科技管理丛书”的同时,结合我们学院学科较多、覆盖面宽、涉及面广的特点,本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人文”的宗旨,编辑出版“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一套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研究领域的综合性丛书,具有基础性、交叉性、哲理性、现实性、综合性的特点,内容主要涵盖科学与人文综合研究的诸多方面。举凡涉及科学、人文及其关系的内容,均收入这套丛书。这套丛书是我校“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院部分教师承担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的成果,或者是来自名校的年轻博士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实现“文理渗透、中西融汇”,促进我国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发展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洪晓楠

2009 年 8 月 8 日于大连

目 录

丛书总序	洪晓楠 1
第一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界定	1
一、对民族精神的基本认识	1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概念与内涵	10
三、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特色	14
第二章 儒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基	36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母体	36
二、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37
三、儒学社会影响的多元性	59
四、儒学为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	68
五、先秦儒学在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	80
第三章 先秦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激励系统的培育	87
一、人最为天下贵——激励系统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	87
二、为仁由己——激励系统的得以落实的能力保障	95
第四章 先秦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教化系统的培育	105
一、圣人可学——教化系统的理论根基	105
二、仁、义、礼——教化系统的主干内容	113
第五章 先秦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协调系统的培育	130
一、群——协调系统的最高原则	130
二、孝、悌、别、信、忠、爱民——协调系统的具体规范	138
第六章 先秦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系统的培育	151
一、和——凝聚系统的最高境界	151

二、执两用中、时中——凝聚系统的总体方法	159
第七章 先秦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安慰系统的培育	171
一、现世今生——安慰系统的出发点	172
二、死而不朽——安慰系统的落实	178
第八章 弘扬儒学精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87
一、儒学对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	187
二、弘扬儒学精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途径	192
参考文献	209

第一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界定

一、对民族精神的基本认识

民族精神问题作为关系民族兴衰的重大课题,自近代以来每至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都会被提及。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可分为两大阶段,其间大致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深刻民族危机,在此情况下,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地审视、检讨民族精神,积极地探索复兴、重铸民族精神之路。资产阶级革命派、西化论者、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等,纷纷发表见解并彼此间展开激烈论争,这一时期出现的关于东西文化之争、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关于儒学与传统道德之争等都是民族精神研究热潮的表现。第二次热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期,如何应对全球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理论界开始围绕这些问题思索、讨论民族精神。第三次热潮发生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一直持续至今。民族精神问题经由十六大报告的阐述,第一次由学术层面上升到国策要求,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民族精神问题的关注,形成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这次热潮是“在党和政府

的大力倡导下形成的,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特征”^①,讨论的问题是在第二次热潮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近百年来,民族精神问题的研究由感性到理性、由肤浅到深入取得了大量成果,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愈益丰满起来。但是,关于什么是民族精神,即民族精神的概念问题,理论界依然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纵观目前已经出现的诸多民族精神的概念,如果按照价值判断来划分,可将其大致归纳为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民族精神定位成进步的积极的精神,认为真正的民族精神应体现民族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是一个民族得以维系和发展的精粹思想、进步观念和优秀文化,不包括落后和消极的因素。如张岱年先生认为,民族精神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②这种对民族精神的认识是理论界的主流看法。第二种观点认为“民族精神”优劣并存,既包含着进步、优秀的成分,又包含着落后、劣根的一面,具有双重性,例如吴来苏先生认为:“一方面民族精神中包含有凝聚力强、崇尚群体、刻苦耐劳、朴实宽厚、和谐谦逊、注重精神价值等积极内容;另一方面又有因循守旧、消极依赖、不倡个体、排斥创新的消极内容。”^③第三种观点视“民族精神”为中性概念,例如李宗桂先生认为:“民族精神只是个中性概念,正如文化传统是中性概念一样,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而不是价值判断。”^④第四种观点则对民族精神作广义和狭义两种区分,认为广义的民族精神是精华与糟粕的共同体,而狭义的民族精神则仅指正面、积极的精神因素,例如,方立天先生认为:“民族精神的广义和狭义之分是相对的,两者都是可以成立的,……广义的民族精神包含了狭义的民族精神,……广狭二义立论民族精神也各有长处和短处……只要确定参照系,界定明确,自圆其说,那就不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立论民族精神都是

① 赵子林. 民族精神研究:回顾与展望[J]. 兰州学刊, 2007(10): 66-95.

② 张岱年. 文化与哲学[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73.

③ 吴来苏. 对构建当代民族精神的思考[J]. 河北学刊, 1997(2): 19-23.

④ 李宗桂. 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凝聚力[J]. 哲学研究, 1992(3): 46-55.

可行的。”^①

本书将“民族精神”作为一个为该民族提供发展动力、帮助该民族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专有名词来对待,赞同第一种观点。本书认为:“民族精神”含义单一,仅指“民族的精神”中积极向上的部分,不包括消极、落后的方面,它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是一个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支撑,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具有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弘扬民族精神,可以提升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可以提升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可以提升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越辩越明,为了更好地把握民族精神的含义,有必要将民族精神与一些相关概念做一下区分,有必要对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作一厘清。

1. 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性格、民族性

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性格、民族性是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同属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文化现象,都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具有同一血脉;它们都体现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点,其形成都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都具有全民性、稳定性、连续性、持久性,其变化都是渐进的、缓慢而细微的;它们都是维系本民族存在的力量,都可以抗拒其他民族的心理和精神的渗入,都是保持民族界限的屏障。但是这几个概念又存在着不同,在日常使用中它们各有侧重。

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族在与外族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自觉,是对本民族的特点以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的意识,是一种民族归属感,它从我方面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形成。梁启超先生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

^① 方立天:《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J],《哲学研究》,1991(5):33-41.

而自觉为我。”^①这一概括切中“民族意识”的要点。熊锡元先生将“民族意识”的涵义更为详细地归纳为两点:第一,它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国家生活中,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②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括民族意识,但要比民族意识的涵义更为宽泛和复杂。它是一个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的总和。它与民族性格和民族性是近义词。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民族性都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心理上的反映,并通过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表现出来,为全民族所共有,反映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其中既有积极的、能促进民族发展的优点,也含有消极的、阻碍民族进步的因素。例如,在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有一段评论爱尔兰民族性格的话写到:“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的可怜。”^③虽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性格、民族性这几个概念含义近似,但在具体使用中,往往又根据具体场合而有所区别。例如,在谈到一个民族的内心活动时,常常使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谈到某一民族外在的行为特点时,常常使用的是民族性格;在谈到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世界中消极落后的方面时,最常使用的是民族性。

民族精神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性格、民族性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族精神采集了它们的精华,不包含消极落后的方面,全部内容都呈现出积极的风采。民族精神能净化民族的心理环境,吐故纳新,从而能起到增强民族意识、改善民族性的作用。

① 梁启超. 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43.

② 熊锡元. 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113.

③ [德]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21.

2. 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

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也是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丰子义教授认为:“在当代语境中,民族主义至少有这样几种基本涵义:一是作为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即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表现出来的认同、归属等强烈情感和持久意识,它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的社会心理;二是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即在特定历史时期出于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潮流,它在不同时期往往有不同的焦点和兴奋点;三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即为谋求民族利益而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上形成的一套行动准则和价值观念,它往往成为一个民族对待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重要战略和策略思想。”^①可见,相对于民族精神,民族主义是一种更加宽泛、复杂的概念,它可以以民族意识的面目出现,也可以以社会思潮的面目出现,还可以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就性质而言,与民族精神仅指一个民族的精神中进步的、积极的一面相比,民族主义则很难笼统地以优劣来判定,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合理、健康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潮流,既崇尚本国民族利益和价值理念,又能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利益和价值理念,在本国利益和价值受到威胁时,能够以一种理性的尽量不伤害第三者的态度来积极地争取自身利益,这样合理、健康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展现,也会促进民族精神的发展。而狭隘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要表现为极端标榜本民族的利益和价值理念,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利益和价值理念视为异端,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以一种非理性的、攻击、谩骂甚至暴力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这样一种狭隘、病态的民族主义貌似非常热爱本国和本民族,而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不能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会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并且会对本民族的民族精神造

^① 丰子义. 民族精神研究的若干问题[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2): 30-35.